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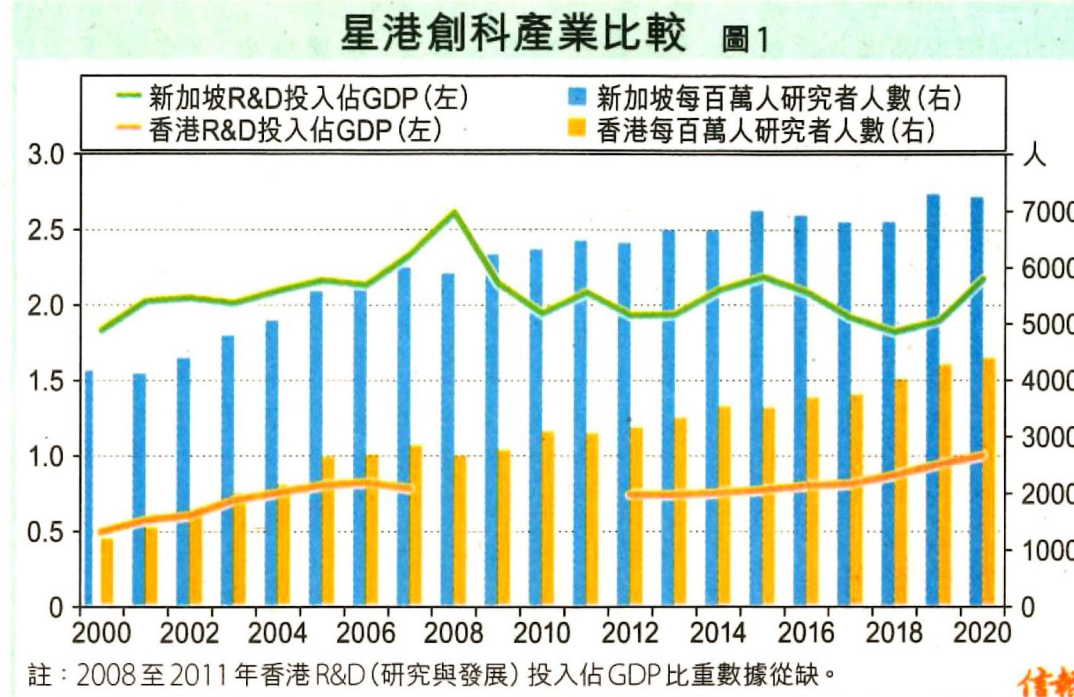
試玉辨才二十年 (五)：研發誰做？

郭樺 鄭宏泰

香港要實現經濟或產業轉型升級，從建立國際創科中心入手，符合全球經濟高智能發展的大趨勢。特區政府從2000年以來推出人才吸納計劃，到最新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目的都是推進科研，為建立國際科研中心匯聚創科人才。但創科行業既需要人才，亦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可說是回報及風險同樣較高的行業。這個行業在香港過往的規模不大，原因是香港以金融和商貿為主的服務經濟模式，並不需要頂尖科技加持，引進現有成熟技術更具成本效益。這也是商界長期流傳俗語「Hi-tech 搵嘢 (蒙損失)，Lo-tech 撈嘢 (賺到錢)」的原因。

雖然香港發展創科風頭一時無兩，這些年政府重視程度增加，但香港實際研發投入一直處在較低水平，香港包括工商機構、政府部門和教育機構等在內的所有部門，研發開支一直遠低於新加坡。例如以兩地政府公布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作比較，新加坡自2000年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已接近2%，到2001年後幾乎均保持2%左右。對比之下，香港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在2000年尚不足0.5%，到2022年才首次突破1%。

另一個指標可觀察從事研發人員的數量，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數數據，每百萬人從事研發工作人員的數量，香港從1999年每百萬人中有1201人上升到2020年每百萬人中有4349人；同期內，新加坡則由每百萬人中有3215人上升到7225人，比較兩地各年份人數差別，香港從事研發人員數量從1999年只佔新加坡的37%，2020年也只增加到佔新加坡60%。【圖1】新加坡人口數量遠低於香港，但兩個宏觀數據比較，反映香港建立創科中心的資本和人力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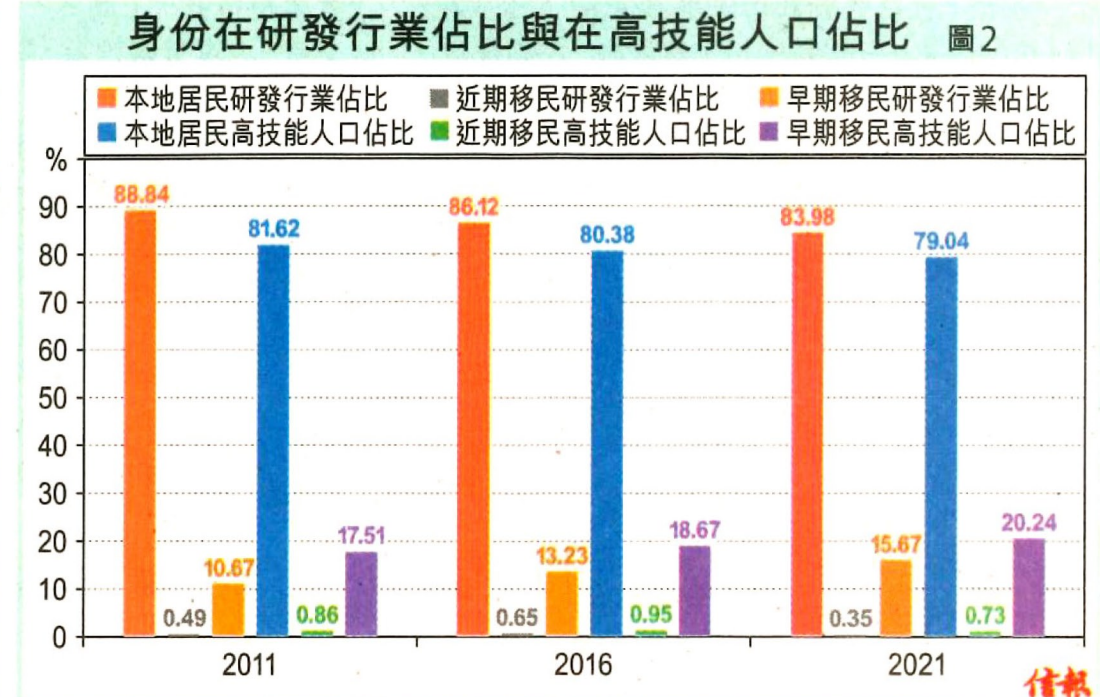
遠落後於新加坡。

一個行業缺乏資金投入，僧多粥少就難保留高技能人才，也無辦法做大整個行業，產生規模經濟效果。例如在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人口普查和人口中期調查數據中，香港人口職業身份和是否從事專業、科學和技術領域的研發工作計，25歲及以上、具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從事研發工作的人口中，本地居民比例佔絕大多數，從2011年89%下降到2021年84%；相比來港居住六年以下「近期移民」從事研發工作比例則從0.5%下降到0.4%；來港居住六年以上「早期移民」佔從事研發工作人口比例則從11%上升到16%。比較三個身份群體高技能人才比例，本地居民從事研發工作人口比例明顯高於其在整體高技能人才比例，而「近期移民」和「早期移民」則明顯低於其整體高技能人才比例【圖2】。數字反映在2011至2021十年間引入的外來高技能人才，能夠從事研發工作的比例仍然較低，特別是「近期移民」能夠從事研發工作的比例下降，不符

合積極吸納科研人才匯聚香港，提供更多科研人才發展路徑的政策目標。

與前面幾篇討論人力資本理論一致，本地居民在研發工作的「超代表性」原因，也可能是由於高技能移民需要時間學習和掌握有關本地專門知識。同樣採用「傾向值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分析本地高技能人才和移民整體從事研發工作機會差距顯示，無論是高技能移民整體、「近期移民」還是「早期移民」，從事研發工作機會要小於本地高技能人才，但不具統計顯著差距。結果說明，本地相關因素可能對從事研發工作機會有決定作用，外來移民可能需要付出時間成本掌握這些本地相關知識和技能才能入行。

從保護本地居民就業的角度出發，因為對有關本地市場的專門知識和技能的把握更好，同等條件下優先聘用本地居民無可厚非。但從事研發工作需要很長時間成本去掌握本地相關的知識，則不符合知識技術的普適性，也不利於吸納外來高技能人才。另外，在投入不足和從業人員



規模細小的研發行業內，讓不同身份高技能人才搞「逐格鬥」，很可能引發保護主義。

香港建立國際創科中心的第一步，不應是引入競爭，而應考慮如何做大創科和研發的行業規模。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顯示，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無法發展創科產業，政府需要「落手落腳」，真金白銀投入去建立創科生態。這條路徑已在內地很多先進城市得到驗證，深圳就是非常好的例子。特區政府成立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已經開始策略性對創科產業進行投資。特區政府如堅持積極投入，建立國際創科中心，實現經濟轉型，應為時未晚。在接着的最後一篇，將討論和總結香港吸納外來人才政策、發展國際創科中心方面的思考。

郭樺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註：2008至2011年香港R&D(研究與發展)投入佔GDP比重數據從缺。